

特别关注

寻找古都的文明记忆

李郁



反映唐代繁荣政治生活的《步辇图》

编者按 2014年,在三秦出版社社长支旭仲、总编辑赵建黎的主持努力之下,《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一书成功申请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立项,并由赵荣和李郁开始合作编写本书。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两位学者博采众家之长,广泛吸收了近年来国内考古和史学界最新学术成果,最近该书已全部完成。在该书面世之前,本报特约李郁先生撰写此文介绍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便大家先睹为快,更好地审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和文化。

说起丝绸之路,人们并不陌生。自从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这个概念以来,便被学界普遍认可,成为古代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代名词。虽然有一些观点认为,从考古的意义上讲,玉石之路要早得多,大概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但是,玉石之路的商业价值和丝绸之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可等量齐观。至于是谁发现了这条道路,司马迁说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凿空”西域,就是开辟西域通道的意思。其实,这样的通道一直都存在,从上古时期到汉武帝朝,人们也正是依赖这条通道做着各种买卖,或明或暗。但是,他并没有被政府和机构纳入交通和商业的经营体系。存在与发现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即使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主体:存在是自然形态,发现是文明形态。玉石之路也好,丝绸之路也罢,甚或有人也称其为香料之路、传经之路等,他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文化和商业意义上的开拓,并不应包含古往今来的那些不同个体之间的物品交换和往来。然而,从张骞开始,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出现了质的变革,东自政府,下至民间,纷至沓来,你来我往,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潮流。因此说,只有从张骞开始,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的发现才正式确立。至于中西交往的历史,少说也有三千多年。人们一定会记得穆天子,其实也就是西周穆王,在位时间55年(前976年—前922年),大约是公元前一千零一年时期。那是有记载的最早抵达西域的中原统治者,影响波及海内外。因而,西王母、昆仑山在中原的文化体系里具有神圣的地位。他的出发地是丰镐,也就是西周的都城,秦朝叫咸阳,汉

朝、唐朝叫长安,也就是今天西安的前身。汉朝的张骞、唐朝的玄奘也都是从这里出发西行,建立了旷世奇功。我们的这本书虽然叫《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但内容依然是讲述西安的历史文化,论述古代西安的地理环境、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科技发展、宗教艺术、文化成就等等。由于研究丝绸之路的学术非常繁荣,出版了很多专著。我们编写本书是为了普及西安的历史文化,通俗性成为第一的要求,因此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加工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如何做出本书的特色,我们便从2016年初开始,按照史圣司马迁的方式,游历了陕西的绝大部分博物馆和文物古迹,期望从最直观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学术的养分。大概只要是写西安的历史文化旅游的文字,蓝田猿人必然是第一个被提出的,否则便显得没有头脑,无从谈起。我们在写作《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的时候,也不能脱此窠臼。农历丁酉年正月二十二日,我们终于完成了对于蓝田猿人的实地考察,这是我们考察的最后一站,原想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然而,结果却令我们大为震惊,倒也给了我们灵感。结合一年多来的有目的、客观的所见所闻,我们不得不回顾所有关于西安历史的有关定义。

现在,每当我们从外地坐火车回西安,过了临潼以后,总能听到动听的声音介绍古城的历史文化,可是不止一次听说“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的古都所在地”,每当这时,我总是惊诧:不是说“十三朝古都”吗,怎么少了一朝。虽然心有不甘,却很快就忘记

多大的歧义,然而对于东汉献帝初期、西晋愍帝时期和大夏国算不算都长安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样的不同表述,原因在哪里呢,有没有评价体系和标准不同的问题呢?究竟什么样的政权才能算作王朝、什么地方才能算作首都?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作为王朝最起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这个政权必须拥有一个公认的家庭统治者,称之为王或者皇帝;第二,这个政权必须拥有中央官僚体系和一定区域的地方政权之配套;第三,这个政权必须拥有一套政治管理制度和礼仪规范;第四,这个政权必须得到当事人(包括敌对方)的认可和承认;第五,这个政权必须有一定年限的存续时间。如果以上五点能够达到,就应该称之为王朝政权,都城就是这个政权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是政治中心,行政中心。

我们速查一下东汉献帝朝和西晋愍帝朝,所有文献和研究著作都承认东汉献帝在位32年(189—220),初平元年(190)初到建安元年(196)七月被董卓劫持,迁都长安,史书上记载得非常清楚,时间虽然只有短短6年零5个月,但是王朝的性质毋庸置疑,长安的都城地位也理所当然。再看一下西晋愍帝(313—316),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匈奴汉赵政权皇帝刘聪南下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汉赵大将刘曜率兵攻取长安,西晋军队拼死战争,不久便收复长安,于是原来驻守长安的秦晋王司马邺被群臣推举为太子,并以太子的名义号令天下,从而存续西晋的王朝命脉。永嘉七年(313)四月,晋怀帝被汉赵毒害以后,长安群臣便拥立太子司马邺继位,改元建

在长安,因此在统计长安建都的王朝时通常并不计入大夏国。但讲陕西建都王朝史的时候,称之为十四朝,就计算了大夏王朝。

文章写到这里,自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那位先生还对其他王朝有异议,那就只有自己根据有关历史的记载研究理解了,那是学术的自由。但是,我以为,作为政府机构在做文化宣传的时候,最好还是相对统一一点的好。本书的关注重心正是西安十三朝的历史。

人类学家说,蓝田猿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北方最早的古人类,却与我们并无基因上的传承关系。或许在蓝田人之后,那些替代的智人并没有放弃这一带的美好家园。于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古老的先民究竟是什么时候逐渐地从古公冶力一带沿着渭河谷地转移到华胥一带,将人类的文明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新起点。大约是六七千年前,他们的后代繁衍不息,将文明的种子撒播在渭河、泾河两岸的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一带,又在四五千年前,构造了高陵的杨官寨文明。

现在的博物馆里,我们所看到的人面鱼纹盆和尖底瓶无疑为半坡人文明智慧和艺术水平以及渔猎文明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至今矗立在关中大地上的那些老式的土坯房屋甚至水泥建造的农家大院,不管是哪一种样式的外观构造,在半坡人的草房样式中似乎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基址原型;还有周原遗址上的天子宫殿和贵族院落,流传了几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国传统宫廷建筑和四合院建筑的经典造型。

上古神话传说和英雄传奇是早期人类文明基因传播的载体。宝鸡姜氏城、北首岭遗址和炎帝的传说、高陵杨官寨和黄帝传说、富平盘龙湾遗址和黄帝铸鼎传说,还有蓝田华胥氏、临潼伏羲女娲的传说和半坡遗址、姜寨遗址,诸如此类,他们之间到底该不该采用附会的方式做个推理?如果不成立,那么又该怎么解释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文化又是如此的相像?

考古学家说要讲证据。当我们的有些学者还在怀疑司马迁《史记》有关上古的记载是不是可信的时候,殷墟甲骨文的出土,使商王朝的世袭得到了证实;宝鸡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将西周的天子世袭完整地呈现出来。如何利用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诠释历史?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所倒逼的考古发掘成果远远超过了过去数百年的发现。这是王国维时代那些大过千百年所不具备的条件,这是当代文化人的幸运。

博物馆学家说要讲影响。陕西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国宝级文物名满天下。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18件国宝级文物,哪一件才是第一的国宝?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



丝绸之路路线图

了。可是,在蓝田猿人博物馆的展厅里赫然写道:西安是周秦汉唐十一个王朝的建都地。又少了一朝。这使我想起我们常常会遇见“陕西十三朝”的说法。诸如此类,与我们多年所遵循的学术共识——“西安十三朝”“陕西十四朝”有所不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国古代文明展”所列十四个王朝在陕西建都,并用详细的表格加以表述。十三个王朝建都西安,一个王朝是建都榆林靖边的赫连勃勃所建的大夏国。我也曾经编写过一本《话说西安十三朝》的书,采纳的就是这个论点。当然,在学术上对于十三朝的观点还有争议。但是,其他说法争论更甚。学界大概对于西周、秦、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包括武周)应该没有

兴。这便是晋愍帝。直到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汉赵大将刘曜率兵围攻长安,司马邺不忍生灵涂炭,便自缚投降,西晋宣告灭亡。建武元年(317),逃到江东的司马睿才继位,史称东晋。晋愍帝在长安虽然不足4年,但是他延续了晋王朝的统治体系,而且被当时的敌我双方都予以承认,承担了西晋王朝那时期的政治、军事、行政和外交职能。当时的长安城虽然残破不堪,但也不失作为都城的存在。大夏国是南北朝时期匈奴族赫连勃勃依据长安和黄土高原一带所建立的王朝,从407年开始称王至431年灭亡,前后经历三代24年的统治。赫连勃勃虽然在长安称帝,但是很快就就师北上,建都统万城,却以长安为南台(即南京)。由于其主要的活动不

兵马俑灵感来自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



人们一直以为公元前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推动了中西方最早交流。但最新发现显示,中西方最初接触时间或再往前追溯1500年。考古学家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灵感源自古希腊。他们还指出,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人甚至直接在秦国培训了本地工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资深考古学家李秀珍(音)表示,“有证据显示,中欧的最早交流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这要比目前的记录提早了很多。”另一项研究显示,秦始皇时期可能曾有西方人在中国西部省份居住并繁衍后代直至死亡。

1974年3月11日,陕西省临潼县农民在秦始皇陵东约1公里处打井时,发现秦陶俑残片及铜镜、弩机等,秦始皇帝陵就此揭开面纱。在秦始皇兵马俑之前,中国没有铸造如此大规模人像的传统。李秀珍认为,外来影响力是兵马俑铸造技术与风格的最好解释。维也纳大学的卢卡斯·尼克教授也指出,秦始皇兵马俑中有代表不同风格的陶俑,其中新发现的翻滚跳跃的杂技演员可以进一步证实考古学家的理论。他相信,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前,秦始皇受到了从欧洲至中亚传来的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影响。“可能有古希腊雕塑家培训了秦国本地人。”他说。此外,最新发现显示秦始皇帝陵比人们之前认为的要大很多,并且面积是埃及帝王谷的200倍。 □李智

周末评论

哪些基层腐败令人深恶痛绝

史云贵

基层,一般是指国家权力结构的末梢,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众的联系最直接。就我国国家权力结构而言,主要是指城乡县以下的政府部门或城乡社区组织机构。所谓基层腐败,实际上就是作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县以下部门或乡(镇)、街办与村(居)组织及其成员以权谋私的贪腐行为。由于基层组织及其构成人员生活在国家权力的末梢,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底层基础和形象代表。因而,他(她)们的言行对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如何看待我们的党和政府。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来看,腐败无论大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此,基层腐败对党和国家的影响不容小觑。

基层腐败问题突出,形式多样 “一切有权力的地方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显然,腐败与滥用权力密切相关。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实质在于以权谋私。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不管在哪个层级,都客观存在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问题。因此,基层腐败也是国家反腐败的重要环节之一。

基层腐败,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和政治生态。尤其是村官腐败,对基层老百姓来说,更是苦不堪言。2016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进行了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统计发现,在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总计有53起涉及村党支部书记违纪违规,占比达到42.4%;总计有23起明确指向村委会主任违纪违规,占比为18.4%。总计有83起属于村(居)两委成员违纪违规,占比为66.4%,接近三分之二。 基层腐败问题突出,形式多样。有专家指出,“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种: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的有之,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的有之,贪污侵占、私分滥发的有之,私办企业、大肆圈钱的有之,同黑恶势力勾肩搭背、沆瀣一气的有之”。笔者对基层的贪腐行为进行了如下分类:

“吃拿卡要”。一些基层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单位和行业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司法权、审批权、市场监管权或掌握的特殊资源,在群众办事时或刁难或搪塞或推诿或拖延。一方面,县乡基层部门对办事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吃拿卡要”。一些基层权力部门把企业事业单位当作“唐僧肉”,尤其是企业要办什么事情,一些基层部门会“吃拿卡要”,并认为是心安理得的事情。另一方面,县乡部门对来办事的广大城乡居民也要“吃拿卡要”。一些基层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获得“好处”,依然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此外,“吃拿卡要”还集中表现在村级干部上面。一些村干部利用自己掌握村居公共事务的权力,要求办事的村民必须“意思意思”。

挪用私分公款。基层挪用私分公款主要是指县乡部门干部设私人小金库和村社干部私分村集体资产。本来,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所有村干部,都应明确“公款姓公,一丝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但现实中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以权谋私,挪用私分公款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十八大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从近年查处的“村官”腐败案件来看,村干部腐败的主体80%以上为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贪污、挪用公款居多,贪污挪用公款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费,隐瞒收入差额款,占地赔偿款,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荒地款等,几乎遍布“村两委”职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圈地卖地。一些县乡干部,甚至村居干

部,在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城乡结合部改造或新农村建设中,盲目圈地占地,大肆出卖村居集体土地现象屡禁不止。例如,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潇浦镇三官村6组是位于江华县境内的“城中村”。2011年5月,以原村小组长蒋某湘、原村会计蒋某跃为代表的8名村民将本组位于县城规划区内的部分土地以5村民一人一亩不等的价格卖给村民建房,蒋某湘、蒋某跃等人将这些非法所得按全村村民现有户口平分,每人共分得12100余元。此外,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汕头市潮南一村官在村人均土地不到0.2亩的情况下,却大肆圈地建造豪华别墅。

私办企业。为有效防范村干部私办企业造成的基层腐败问题,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理顺村“两委”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现实中,一些村“两委”主要成员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或实际控制人的现象较多。一些基层村由于“政经不分”,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不得不承担一部分经济职能,资产的管理和交易存在一定不规范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些基层腐败的根源。 “截留冒领”。随着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和国家财政惠农补贴的增多,一些县乡、村居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私下违法、冒领国家惠农补贴和扶贫款的现象非常突出。贵州2014年立案查处3700多起贪污惠民资金案,海南南瓜大棚补贴资金挪用12个农业局长,河南一民政所长用267本存折先后冒领低保户50余万元“养命钱”……这些不时见诸媒体的“截留冒领”报道,既反映了“拍苍蝇”的成效,也让人愕然于“蝗虫”的贪欲之强烈、手段之卑劣、为祸之广泛。可以说,基层干部“截留冒领”是基层腐败的重要表现。

私养情人。有的县乡部门干部,甚至村居干部肆无忌惮养情人、乱搞男女关系、道德沦丧。一方面,个别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利诱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或女性村民。另一方面,个别掌握基层实际权力的部门或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有实力的村(居)干部还不满足“吃窝边草”,甚至挪用单位公款或“小金库”包养情人。 染黑涉黑。当前,基层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黑化”隐忧。尤其在一些经济活跃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地区,个别村干部目无法纪,他们操纵选举、笔路打手、强行敛财,摇身成为百姓深恶痛绝的“黑老大”。他们靠拳头和恶名,采取非法手段操纵选举,侵吞集体财物,侵害群众利益,将村委会班子变成了自己的天下。 基层“蝇贪”如果不得到有效治理,就会“纵蝇成虎”,酿成更大的腐败 “老虎”一般指那些动辄贪污千万上亿的高官巨贪,“苍蝇”一般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基层腐败行为。“老虎”固然可恶,“苍蝇”更让人恶心”。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因为基层“蝇贪”危害不浅,影响恶劣。 基层“蝇贪”侵害的是老百姓最直接的切身利益,最让老百姓反感。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虽然腐败程度较小,但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行为会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恶劣。在人民群众看来,“老虎”虽然可怕,但“苍蝇”离得太近,不会直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苍蝇”每天扑面而来的数量众多的“苍蝇”是直接损害老百姓自身利益的腐败,是看得见的腐败。这些发生在人民群众周围看得见的腐败,直接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同漫天飞舞的苍蝇,时时扑面,更让老百姓恶心,更让老百姓憎恶。 基层“蝇贪”如果不得到有效治理,就会“纵蝇成虎”,酿成更大的腐败。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些大的腐败行为都是由基层干部长期以来的贪腐“小恶小患”开始的,基层干部以长期的“蝇贪”中,逐渐激起了他们“贪大”的欲望,并形成了“贪大”的路径依赖。 基层腐败会造成“苍蝇扑面”,严重恶化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界的“绿水青山”,更迫切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如果基层腐败不能得到有效治理,“苍蝇”扑面,就会严重恶化党和国家政治生态,破坏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进而恶化社会生态。以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全面治理基层腐败,要坚决铲除“苍蝇”栖息的场所,对基层“蝇贪”不能有一丝一毫地纵容。



探索与发现